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地位与作用的百年认知^{*}

杨凤城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对于文化本质与功能、地位与作用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进，先是为阶级斗争服务、从属于政治；然后是为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接着认识到文化与综合国力，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等的深远关系；最后是文化之于民族根基、标识，之于民族复兴的意义与作用等。这些认识背后，是革命、建设、改革所带来的历史性文化课题的形成与解答。

〔关键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综合国力；民族凝聚力；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K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21)04-0004-11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历史奋斗中，高度重视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设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这是和其对文化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正确地回答“为什么”，才能确定科学的文化建设目标，并走出符合实际的文化发展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回顾中共对文化本质与功能、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以史鉴今，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中共从成立之日起便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世界包括文化问题的思想武器。对于什么是“文化”，早期的中共党人既从广义上进行言说，即视文化为人类生活或文明的样态，也从狭义上进行界定，即特指精神文化。而在关键问题和工作部署上，多是在狭义上使用文化概念。陈独秀早在1920年4月《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就指出：“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音乐这几样。”^①有学者研究指出：“五四时期现代狭义文化概念的最早一批使用者中，就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信奉唯物史观的思想先驱。”^②从狭义的文化概念出发，依据唯物史观，早期的中共党人在文化问题上形成了一些基本认识。首先，文化建筑在社会经济生活之上，决定于物质或经济基础，换言之，“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副产”^③。其次，文化是有阶级性的，有封建宗法文化、资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它们分别服务和隶属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上述结论，可以在陈独秀、瞿秋白、杨明斋等共产党人的著述作中见到，可以在1923年前后中共党人参加“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文章中看到，这些结论无疑源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讲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历程和经验研究”（17ADJ005）的阶段性成果。

①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

② 刘辉：《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③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1页。

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马克思还讲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②概言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和阶级论，构成了早期中共党人看待文化本质与功能、地位与作用的理论基础。

正是依循上述认识，中共十分重视革命文化工作，视文化革命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23年中共中央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中就有“反对东方文化派”“反对宗法社会之旧教义”“反对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组织”等要求^③。瞿秋白撰文指出，中国革命不仅要清除“宗法社会的专制主义，笼统的头脑，反对科学，迷信”，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琐屑的对付，谬解科学”，开展“思想方面的阶级斗争”^④。1927年中共开始独立领导开展土地革命。在革命根据地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来教育全苏区广大的劳苦群众”，“是革命战争伟大胜利的必要条件”^⑤；“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⑥等认识明确而坚定。

及至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于文化本质与功能、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更臻于成熟，这一认识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等文献中得到充分阐释。首先，“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与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换言之，“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⑦由是之故，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封建宗法文化；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买办性的封建主义的文化”^⑧；以革除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与经济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其次，“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因而“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从属于政治”^⑨。再次，中国革命“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仅有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革命文化“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⑩。

延安时期形成的上述关于文化本质与功能、地位与作用的系统而明晰的认识，其核心理念在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30年间基本上延续下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4页。

④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8、284页。

⑤ 《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280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127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⑧ 《张闻天文集》（三），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866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7、848页。

十分重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思想文化亦必须进行革命性变革；另一方面，思想文化作为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部分，应该促进和配合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无论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清理封建的、买办的旧思想旧文化，还是开展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连续发动的文化批判运动，还是声势浩大地宣传唯物主义、毛泽东思想；无论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大规模开展的“文化革命”“技术革命”“教育革命”，还是日后“左”的“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乃至“文化大革命”，均是上述思想认识的体现。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地位与功能的认识，出现重大调整，形成与时俱进的新认识，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初期，最主要的新认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叶剑英委员长代表中共中央发表的国庆30周年讲话，正式提出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①以往讲社会主义，人们往往强调的是消灭剥削制度、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以及无产阶级专政，还有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生产力前景等。十二大报告指出“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还不足以完全包括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②十二大报告提出的这一马列主义原典里所没有的新结论，却是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据的，进一步言之，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体，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社会主义特征与优越性既体现在物质、制度上，也体现在思想文化上，这是就理论言之。就现实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不是在物质现代化方面，而是在目标追求、制度安排、价值观与道德理想方面，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精神文明的制度特征和优越性体现更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市场和资本支配下较普遍地存在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至上等不同，主人翁思想、集体主义、甘于奉献、理想远大、爱国家、有纪律等等，“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③，占据着道德制高点，这也许就是邓小平为什么一再强调“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因；也许就是邓小平认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需要等到物质文明发展到多高的程度，也不必苛求人民群众具有多高的教育程度的原因；也许就是邓小平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6～27页。

③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编辑出版：《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2年，第59页。

慕”^①的原因。

中共中央提出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这种社会主义建设的二分战略布局本身就说明了党对文化建设战略地位与作用的新认识，对文化功能与作用空前的高度评价。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全党同志必须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②这就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文明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地位，实际上是在调整长期以来过于强调文化的配角地位及其对于政治经济的辅助与配合作用的认识，开始意识到文化的整体性能动作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③。所谓“精神动力”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集体主义、爱国奉献、奋发图强等价值观念；所谓“智力支持”就是教育科技文化的发展；所谓“思想保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信心，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凝聚力的舆论力量、意识形态。此后的中共十三大、十四大报告重申这一认识，强调精神文明对于推动物质文明发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意义，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关乎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与思想保证，是中共关于精神文明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中作用的总概括，反映的是中共对文化定位的新认识。

及至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第二个精神文明决议，对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又有了更深入也更具体的认识，即聚焦于中国跨世纪的发展，聚焦于市场化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带来的“历史性课题”。进一步言之，就是如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如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如何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④。这些认识表明，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定位体现出鲜明的时代问题意识。

当然，无论是党的代表大会有关精神文明的阐释，还是两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对于精神文明战略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一言以蔽之，就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服务。这里，一方面体现了党对文化地位与作用之认识的巨大转变，即文化不再为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理念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又存在经验与思维的继承性，这就是文化建设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过去是服务于革命战争、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现在要服务于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

三、“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与“民族的血脉”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⑤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36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3～117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174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9～2050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①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②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又增加了“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变成四个“越来越”,要求“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③,党的十八大重申了这一认识。上述论断集中反映了党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在对外开放全方位拓展、在实现小康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跨世纪发展进程中,对文化地位与作用的新认知。

进一步言之,在世纪交替之际,正是国际社会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前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文化交流交锋更加频繁。中共认识到,在全球日趋密切的合作与日趋激烈的竞争中,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日益结合,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逐步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尺。1995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便是这一认识的反映。“科教兴国”就是要突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地位,突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④;突出综合国力的强弱和经济发展的后劲“越来越取决于科学技术和劳动者的素质”^⑤,而科学技术和劳动者素质离不开教育这个基础,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需要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科教兴国”战略表明党对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有了更高也更具体的认识。由此出发,随着时代的发展,党进一步认识到,不仅是科技与教育,其他文化要素构成的“软实力”同样不能小觑,文化所提供的价值观、精神力量无形而深远,因而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要赢得主动,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同样需要强大的文化实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⑥,这就是党的代表大会不断言说文化作为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时代原因。

与上述世情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世纪之交的中国国情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概括言之,经过市场化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国的社会结构、阶级阶层利益、民众价值观与审美偏好等均呈现多元发展格局。如何在全球化、市场化时代凝聚人心,团结全民,同时改革创新,立于时代潮头,成为中共执政的重大课题。于是,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关于文化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关系成为重要论题,在该方面形成的认识可以视为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重要标志。因为其背后是中共认识到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⑦,体现着国家和民族的性格,“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⑧

在这里,“民族性”是核心,民族凝聚力是问题和认识的源起。民族凝聚力作为民族团结、生存和发展的情感、心理和价值观的精神纽带,内涵并不复杂,它被发掘和认同是和1980年代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0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0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235页。

⑥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92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558、561页。

中后期的中华传统文化危机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80年代不亚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西学东输的“文化热”中，传统文化遭遇激烈批判和否定，西方文化才是现代文化，而中国固有文化则是影响现代化且未曾得到过彻底清理的前现代文化，这一认识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颇有市场。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往往导向“全盘西化”，因而与政治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结缘。“八九”风波促使中共认识到中华文化尤其是民族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建设”“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学术讨论会在党和政府支持下不断召开，尤其是1990年1月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发表《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的长篇讲话，高度评价中华传统文化，系统阐述弘扬传统文化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意义，要求充分尊重和弘扬民族文化。此后，在市场化、全球化、多极化的时代潮流中，中共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对于民族认同、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认识到5000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①；是民族创造力的根基、是独树一帜（而非步人后尘、东施效颦）、“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生发土壤；“文化哺育和传承了民族精神，滋养着民族的生命力，激发着民族的创造力，铸造着民族的凝聚力。”^②这些结论，标志着具有时代价值的文化自觉历程开启了。

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文化需求，这是常识。这一常识在中共那里始终存在，也许正因为是常识所以历史上并未着意论说，只是在进入新世纪后才郑重其事地时常强调文化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这是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因素：其一，在中共历史上，对于文化的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突出的是它和党的时代任务的关联，强调的是服从和服务于革命、建设、改革的中心工作。其二，专注于文化的教化功能，并由统治者和精英决定教化的内容和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成长于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上的中共同样重视文化“教育人民”的作用、培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作用。作为一个执政党，如此定位文化并没有错。但同时，必须承认，将文化的功能限于“教化”，而且以自上而下的“上帝”视角，单向、单一的传输方式也有其局限性。其三，也是更重要的，伴随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伴随中国总体上实现小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展，伴随教育的普及和民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伴随现代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空前强烈也空前多样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文化观念，从执政党和国家的单一需要出发自上而下地看文化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时代。对文化的功能与作用需要更立体地多方面审视，执政党需要换位思考，即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从其内生性主体性出发看精神需求，尤其要正视多样化面相包括那大量存在的并非高大上、并非阳春白雪的世俗化文化需求。这才是中共提出“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这一认识的时代背景和真正意义所在，其中满足人民“多样化”的精神需求是关键，其背后是正视人们精神需求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文化满足人民精神需要这一点，和中共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密切关联在一起。世纪之交，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共开始论及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后，直接影响着对文化功能与作用的认知，由此，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一文化的最本质功能得到真正认可和重视。

①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新华社北京2006年9月13日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41页。

至于文化“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这一结论,除了上述文化之于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外,直接和中共对文化产业的认识相关。世纪之交,伴随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的经济功能日趋凸显,经济的文化含量不断提高,文化产业成为西方大国的支柱性产业。美国的电影产业、英国的创意产业、德国的出版产业、日本的动漫产业,不仅成为创造利润和财富的重要来源,而且成为产业全球扩张的利器。中国在进入新世纪后开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201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依据国际经验,人均生产总值达到三千美元之后,文化需求会呈“井喷”之势)。伴随物质生活的改善,民众精神文化需求迅速增长并且呈现多层次、多方面的多样化特点,而要满足这种需求只有通过市场,而市场的主体是文化产业。2001年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压力预期,进一步促使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产业问题。2000年出台的“十五”计划明确提出要发展“文化产业”。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①。此后,“文化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写入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文件中。另外,不可忽视的是,进入新世纪,中国推动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与要求比以往更加迫切。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文化产业具有优结构、扩消费、增就业、促跨越、可持续的独特优势,属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兴绿色产业^②。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提出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到2020年实现这一目标。

关于文化地位与作用的新认识,还必须要提到的是“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与阐释。在2001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提出“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③这是首次将以德治国提升到与依法治国并列的战略高度。以德治国的首要意义当然是政治的,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但同时,它也是文化的,是对精神文明之重要性的新认知,即所谓“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④。以德治国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政治文化传统,古代的“德治”和“为政以德”是要求统治者用高尚的道德约束自身,引导民众。而中共提出的以德治国,其主要内涵是“以德育人”,根本目的是提升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并且这个“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当然,以德治国也含有对执政党的建设的要求。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将硬性的强制规范和软性的社会规训结合起来,相互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由此得到新的提升。

综观世纪交替大约20年时间段内中共对于文化本质与功能、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创新性见解迭出的时代,是一个与时俱进特征显著的时代,是一个文化深层理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是一个奠定现代国家的文化基本认识框架和方向的时代。关于文化与综合国力,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论断,关于文化关系社会主义兴旺发达、关系民族振兴的结论,都是过去没有至少是没有明确的新认识。之所以能够得出这些新认识,关键在于中共“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⑤,与时俱进,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满足人民丰富的精神需要之功能的强调,对文化作为民族根基、血脉和人民精神家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1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74~77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7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5页。

园的定位,标志着中共在文化地位与功能方面的认识日趋深化、深层观念有了重大发展。基于上述认识,沿着已定方向,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文化的本质与功能、地位与作用的认知又有了丰富和创新。

四、民族基因与标识、民族复兴“强大的精神力量”

以党的十八大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迈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其中就包括对文化地位与功能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变化、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居于世界前列,中华大地“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①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迈出关键步伐。伴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人民币,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截至2020年11月底,中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过上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立足于新时代,处在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大历史观和宏阔的国际视野看文化,在文化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上得出系列新认识。

首先,强调文化于民族和国家的根基、灵魂和基因、标识意义,于民族和国家的存续与发展的聚合作用。习近平作为总书记不断论及,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植根于五千多年文明沃土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立于当今激荡世界的根基^②。

以大历史观之,文化是民族整合、延续和发展的最核心最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换言之,中华文明从远古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培育和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③

展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然包括中华文化复兴,“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④“没有文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25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页;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页;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2日;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9日。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19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21页。

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①

回顾中共党史,可以看到,习近平对于文化地位与作用之认知的历史继承性和时代创新性。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共审视民族与国家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均突出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的是文化对于经济、政治的辅助、配合作用,而缺乏对文化自主性、引领性作用的认识。进入新世纪后,文化之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意义,文化作为民族血脉、人民精神家园的意义,开始出现在党中央重要文本的论述中,表征着党对文化地位与功能认识的与时俱进。以此为基础,习近平进一步从国家与民族的悠久历史传承与文明根基、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定位文化,并展开全方位阐释,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创新了相关认识。

其次,将文化自信提升到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的地位,并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力量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②。2014年10月,在中央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发表的讲话便提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③在2016年5月中央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④同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明确地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列提出,并指出文化自信与文化力量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更广泛,引起广泛关注。

回顾历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历史使命就是要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经过28年的革命,这一任务初步告成。说是初步告成,是因为要站稳、不再倒下尚需继续奋斗,那就是把落后的农业国建成工业国。为此,中共率领全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作用,就是配合和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经过近30年努力,中国终于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巩固的国防,从而有尊严地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依然贫困落后。为了赶上时代,通过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进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又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居于世界前列,成功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大成功带来的道路、理论、制度自信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基础,催生着文化自信。可以说,文化自信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道理很简单,当一个国家在全力以赴为生存为尊严而战之际,当一个政党殚精竭虑于摆脱贫困落后、加速现代化之时,是不可能提出“文化自信”这一命题的,这一命题只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才具有真正意义。

当然,一个核心观念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事实上,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和胡锦涛在全会上的讲话都提到“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均重申了这一命题。正是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度,

①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21页。

④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习近平提出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并有机融为一体的文化自信新理念,并指出坚定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的提出和阐释彰显了中共认知文化战略地位与作用的新时代站位。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中国道路的成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①中国前所未有地广泛参与国际治理体系变革,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地构成命运息息相关的共同体。立足于新时代,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文化或文明的世界意义作出系统阐发,指出文明的多样性是多彩世界的根基和体现,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物之不齐,物之情也”^②,此其一。其二,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交流互鉴而更加丰富多彩。“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③,让文化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④。

在不同文明相互激荡的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来源。伴随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迈进的历程,借助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展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展现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共看待文化地位与作用的另一着眼点。通过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与对象国的相互了解、增进友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的一贯认识和做法。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在此基础上让文化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服务于增强国家软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华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习近平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灿烂的中华文化,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⑤。

综观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文化地位与作用的认知,可以看到,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贯通中国与世界,构成其方法论的显著特征。无论是对文化之于民族根基、灵魂、标识、基因作用的阐释,还是对文化自信与文化力量重要性的阐释,以至对文化与世界文明多样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的阐释,均是纵横古今、贯通中外、着眼现实、面向未来,均是在中华5000年文明史、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新中国70年的历史、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中进行纵深考察,均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实践提供的经验与启示,以问题为导向,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作出的战略分析,均是秉承“大道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页。

②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求是》2019年第9期。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1~42页。

④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求是》2019年第9期。

⑤ 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01页;《习近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人民日报》2018年8月23日。

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胸怀，以扩大中华国际吸引力和感召力为出发点，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作出的阐释。只有这样的视野、这样的高屋建瓴，才能得出符合时代、契合实践的结论，也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将中华文化导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王昌]

《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3期要目

中国共产党百年与百年大变局	曲青山
百炼成钢的中国共产党	
——关于百年党的建设史的几个问题	欧阳淞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研究	吴德刚
中国共产党统一财经的缘起与初步实施	闫茂旭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关系再考察	郝江东
革命纪念与政治动员：一九二六年中共对五卅周年纪念的实践及其政治意涵	张仰亮
计划经济时代影响中共经济决策的主要因素	萧冬连
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出口私商的管理制度变革	
——基于上海口岸的历史考察	严宇鸣
新世纪以来中共创建史研究综述	张会芳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与顾颉刚民族思想的学术转向	奂平清
中共党史视野下的党内法规研究	赵淑梅
美国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评介	赵继珂